

92
K280.0
1
2

《维吾尔人》等 三本书问题讨论会 论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B

962793

主 编 冯大真

副主编 阿吾提·托乎提

刘志霄

目 录

- 民族中分离出去的错误观点 阿吾提·提乎提(178)
必须正确认识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柯尤慕·图尔迪(191)
- 中华民族统一、团结、进步的历史主流不容否定
——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民族关系史方面的错误观点 刘志霄(195)
- 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诋毁 张宏超(210)
- “共同文化”论的弦外之音
——评《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书的文化观 刘宾(221)
- 《维吾尔人》一书对语言名词方面的歪曲和杜撰 伊不拉音·穆提义(233)
- 鼓吹泛突厥主义就是煽动民族分裂主义 纪大椿(244)
-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根源
——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批判 钱伯泉(259)
-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问题及其思想根源 艾买提·毛拉土尔地 邢松真(280)
- 《维吾尔人》的要害是宣扬民族分裂主义——
评吐尔贡·阿勒玛斯《维吾尔人》一书 贡合甫·朱奴斯(287)
- 论回纥与唐朝的关系 王有德(296)
- 评《维吾尔人》一书在史前史上几个关键问题的谬误 侯灿(307)
- 为什么要曲解“桃花石”? 郭平梁(320)
- 历史并非神话 伊敏江·艾合米迪(326)
- 汉朝统一西域及其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 苏北海(332)
- 《维吾尔人》是唯心史观的产物 库吐鲁克·伊敏(343)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南

——评《维吾尔人》一书	杨发仁(354)
维护祖国统一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尼合迈德·蒙加尼(371)
尊重历史 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	
——驳《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形成、发展历史的歪曲	艾则孜·玉素甫 林 声(377)
编后记.....	(389)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评析《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政治错误

(代序)

冯大真

在 1986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0 月这期间,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三本书曲解、篡改以至杜撰史料、伪造历史,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在维护祖国统一还是分裂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还是破坏民族团结、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宣扬泛突厥主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三本书问题的讨论和批判,是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民族分裂与反民族分裂的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三本书的问题,只有在深入剖析其错误,辨明事实真象的基础上,才能撕去其学术研究的外衣,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对于《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问题,自治区党委是很重视的。早在 1990 年 2 月,区党委宣传部就根据读者的反应和区党委的指示,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对三本书进行了调查和初步审读。后来,又将三本书译成了汉文。1990 年 11 月 15 日至 30 日,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和三本书作者的要求,我们又集中了以新疆社会科学院为主的多民族的近 30 名有关专家、学者

和领导，再次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进行了审读。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等全国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专家，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参加了审读。通过审读，向区党委提出了关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审读报告和审读意见。在这期间，自治区党委于去年5月和12月，先后两次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讨论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问题和专家们的审读意见，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指示。在过去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91年2月1日至2月7日在乌鲁木齐又召开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这说明，自治区党委对三本书问题的处理是非常严肃、非常慎重的，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稳妥的，因而赢得了各民族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

下面，围绕着三本书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错误

三本书的错误很多，有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有理论观点上的错误，也有研究方法上的错误。但是从政治上考虑，三本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一是作者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居然把维吾尔族和我国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

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的历史就是我们伟大祖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它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汉族接触频繁，且深受汉族的先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它的经济文化也同样影响了汉族。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但是，三本书却无视历史事实，居然把维吾尔族历史写成了一部“独立史”。

比如，古代维吾尔族在漠北建立的鄂尔浑回纥汗国，总共有过 15 位可汗，其中就有 11 位是受到唐朝册封的，这是回纥汗国臣属于中央王朝的铁证。对此，三本书只字不提，反而说什么“极为强大的、独立的回纥——鄂尔浑可汗国，在当时同亚洲的大国——唐朝和吐蕃处于平等的地位。”喀喇汗王朝众多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本来是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可汗，喀喇汗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书中却歪曲“桃花石”一词的含义，硬说“桃花石”不是指中国。对于西迁回纥一支——甘州回鹘在甘肃建立的地方政权（即书中所谓的“坎苏回鹘汗国”），仍然按照回纥汗国时期的惯例，在新可汗继位时，向中原王朝报聘，请求册封这一史实，在书中也被说成是“实际上坎苏回鹘汗国与中国的王朝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们由于根深蒂固的唯我至尊的传统，把毫无意义的爵位赐给了回鹘汗国。”

单是这样还不够，作者又把诸如欧洲匈奴帝国、白匈奴帝国、伽色尼王朝、大塞尔柱苏丹国、花喇子模国等与古代维吾尔人没有关系的一些所谓“国家”，与回纥汗国、喀喇汗王朝混在一起，凭空杜撰说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 11 个“伟大的、强有力的、富有的、文明的国家”，并以此证明自己编造的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就是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神话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在《维吾尔人》和《匈奴简史》中，作者还多次说过，古代中国的疆域北不过长城，西不过黄河。在作者笔下，中国就等于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不仅维吾尔族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且连匈奴、乌孙、大月氏、鲜卑、柔然、突厥等我国古代北方众多的民族，也都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生息和活动的地方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也都不是属于中国的疆域，而是与中国并列的、独立的“国家”，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二是作者无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极力渲染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敌视、仇杀和吞并的支流，把我国的民族关系

歪曲成为一部战争史。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和睦共处、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它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其基本内容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民族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和谐地发展的，而是伴随着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有时甚至表现为互相争战。但是，若从民族之间战争的时间与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时间相比，后者要比前者长得多。所以我们说，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统一、团结、交流、进步，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写历史就要实事求是地去揭示我国历史发展的这个本质的方面，做到有利于今天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才是历史学家的崇高责任。

但是，三本书作者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着力渲染历史上定居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忽视或者避而不谈历史上定居的汉族人民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了许多世纪的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系，有意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为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史，特别是歪曲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笔下，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古代各少数民族之间除了不断的征战之外，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对立的关系之中。因为，中原汉族政权“若要安然放心，就不能允许自己周围哪怕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就要让自己周围的国家都臣服。”所以，汉朝将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书中认为这是“匈奴与汉族之间的半友好关系”。讲到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时，书中说“这两个邻邦就是在安宁时期，相互间的‘友好’来往也没有诚意”。书中还说：“回鹘亦都护汗国同宋朝的关系，表面上是似乎和睦友好，实际上彼此难以发生影响”，等等。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三本书有意歪曲史实，费尽心机编造中

原政权及汉族人的所谓挑拨离间和背信弃义。东汉时的班超，在西域活动30多年，为国家统一和西域地区的和平积极奔走，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但三本书中却说什么：“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挑动双方互斗，使他们互相争战，导致多次流血。”作者还把东匈奴与西匈奴、所谓的“土拉”和鲜卑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都说成是“由于汉朝的挑拨离间”，还告诉人们：“尽管东匈奴在击溃自己的骨肉兄弟西匈奴时拼命为汉朝效劳”，但后来自己却“终为曹操所灭”。在历史上，明明是回纥为了摆脱突厥汗国的统治，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不断联合唐朝反抗突厥，最后建立了回纥汗国。但三本书胡说什么“突厥人的敌人”，也即是唐朝“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让回纥人反对突厥人”。在讲到鄂尔浑回纥汗国崩溃后南迁回纥部众的命运时，书中不是按照史实去讲唐朝妥善安置南迁回纥部众的情况，而是带有煽动性地说：“唐朝不讲信义，另有谋算”，不肯出兵帮助恢复回鹘汗国，对曾经出兵援助过唐朝的回纥“背信弃义”。还说，“西迁回纥部众‘汇入当地同胞之中’，而南迁回纥部众的‘命运甚惨：所信赖的邻人加害于他们。’”总之，书中的基本观点是，“用野蛮的外族消灭野蛮的外族是中原汉族政权传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哪里是在写历史，分明是在借古讽今，恶意地煽动挑拨，制造民族不和。

三是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不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民族关系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维吾尔人》一书“出版社的话”说，三本书的作者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分析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个科学方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错综复杂、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对历

史作出科学的回答。而三本书的作者恰恰不是这样。由于作者站错了立场，观点不对头，结果对我国多民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分析评论。

比如，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历史上的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在历史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所有的统治阶级，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游牧贵族，出于其阶级利益，都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兼并、征服、抢掠其他民族和地区，这是民族之间战争的根源。民族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不同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往往都是实际受害者。另一方面，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建立正常的农牧产品交换，结束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掠夺和侵扰，进而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和睦。因此，那种以掠夺和维护分裂割据为目的的战争是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以确保边境安宁、实现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总之，对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具体分析。然而，三本书却不是这样。对我国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战争，作者不是把它放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去分析，也不去分析其中的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而是刻意告诉人们：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是维吾尔人的祖先，所以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包括掠夺性的战争，破坏大统一的战争，统统都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而中原王朝是汉族，所以他所进行的战争，包括反对掠夺的战争，有利于大统一的战争，就成了“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基于这种立场，作者在《维吾尔人》这本书里，把赞成维护国家统一和主张民族和好的历史人物，都骂作“叛徒”，而把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原王朝的人，说成是“狮心英雄”，而且号召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和

独立而斗争和正在斗争的人们”，象“狮心英雄”那样，去为他所谓的人民的“解放和独立”而进行“斗争”。一褒一贬，作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

总之，三本书的错误是严重的。它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放肆地鼓吹和散布以民族“独立”为核心的一系列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观点，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三本书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与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说，三本书的错误，不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而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错误。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这里顺便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维吾尔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有着值得自豪的悠久历史，在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开拓祖国疆域、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维吾尔族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新疆历史的重要方面。搞好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自治区社会科学和文化界的光荣任务。现在有人认为，三本书问题是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许多专家的发言表明，三本书根本不是什么“认真负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写出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面貌”，而是在歪曲历史、编造历史，抄袭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是在有意识地宣传某种政治观点。对这样的所谓历史著作，我们如果不开展必要的讨论和旗帜鲜明的批判，任其错误流传，那我们就是对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极端不负责任。我们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批判，还维吾尔族历史的真面目，这才是对维吾尔族历史的真正尊重和肯定。

二、“三本书”给我们的思考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于 1986—1989 年，在我区两个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其错误观点流毒全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主要的教训有三个方面：

第一，三本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和影响下的产物，是《东突厥斯坦历史》这一分裂主义的代表作在今天的翻版。三本书的出现，不仅有它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而且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是以泛突厥主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对三本书的批判同肃清泛突厥主义及其代表作《东突厥斯坦历史》的影响结合起来，才能切中要害，抓住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思想实质，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泛突厥主义，是在 19 世纪末叶和 20 世纪初叶在国外兴起的社会思潮，它代表了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其特点是抹煞阶级矛盾，主张把突厥语系的诸民族，组成大突厥帝国。这一社会思潮是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而传入新疆的。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势力争夺的一块重要地方。他们同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势力纠合在一起，以泛突厥主义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疯狂地进行分裂新疆的活动。穆罕默德·伊敏就是这样一个鼓吹和积极推行泛突厥主义的头子。1933 年他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墨玉县组织暴动，占据和阗，自称“和阗王”，而后又同沙比提大毛拉一起，在喀什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永久独立”的国家，“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

族”。但是这个短命的反动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就遭到了彻底覆灭，穆罕默德·伊敏随即亡命国外，于1940年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历史》这部反动著作。

《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部向新疆鼓吹和移植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作，集反动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之大成。它极力拔高所谓“突厥民族”的历史地位，任意夸大所谓“突厥国家”的疆域，肆意鼓吹所谓“共同的突厥文化”，煽动大突厥主义的狂热。它把帝国主义带有明显侵略意图的“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强加在新疆头上，宣扬新疆是“世界上最古，最有名、文化最早发展”的“独立国家”；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宣称要“增强”东突厥斯坦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宗教观念”；煽动新疆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努力奋斗”，“永远脱离中国的束缚”；它恶意歪曲新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和平统一的历史发展主流，把这种关系说成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把汉族当作各少数民族的敌人，等等。其反动观点集中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口号，即“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说到底，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妄图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国外的敌对势力还在利用各种途径向新疆进行渗透，继续宣扬《东突厥斯坦历史》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也把这本书奉为至宝，吹捧为“科学的历史巨著”，并秘密打印散发，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现在，我们正在批判的这“三本书”，虽然没有像《东突厥斯坦历史》那样明白地提出东突厥斯坦问题，甚至还将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扮自己，但其基本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是《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翻版，因而也是有害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这一切表明，《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政治思想上是反动的，至少在有些人的思想上影响是很深的。对于民族分裂主义

势力来说,这本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进行反革命行动的指南。巴仁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教育了我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不经过批判斗争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会毒化我们的空气,腐蚀人们的灵魂。现在是到了彻底批判《东突厥斯坦历史》并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只有把对三本书的批判同对《东突厥斯坦历史》的批判联系起来,才能看清三本书错误的严重性,才能够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连根拔除,教育我们的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把社会主义的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第二,三本书的问题也反映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是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突出表现。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夺取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夸大这种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是错误的,但是,无视这种斗争,看不到这种斗争,同样也是错误的。

新疆解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形式不一样,一切分裂主义活动的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为其精神支柱,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目标,从而使斗争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分裂祖国统一还是维护祖国统一这一根本问题上。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国外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的影响下,随着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新疆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加剧,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遥相呼应,蠢蠢欲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本书也相继出版发行,通过对历史的歪曲、篡改和伪造,散布了大量损害祖国统一、危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客观上起到了适应

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政治需要,从根本上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

三本书的问题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敲响了警钟。当前,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在政治思想、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也程度不同地仍然存在。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不去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那我们就可能犯极大的错误,以致影响自治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所以,希望各级党委特别是意识形态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抓紧抓好。要经常掌握和分析不同阶层的思想状况,抓住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扎实实地予以解决,以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块阵地,都能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

第三,三本书的问题还告诉我们,提高各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敏感,增强政治原则性和政治坚定性是何等的重要。对三本书的错误,有的同志觉察到,有的同志没有觉察到,个别的同志甚至还盲目吹捧,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出版了这三本书,明天也许会出版另外一些什么书。这不仅仅是出版部门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思想战线上都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我们一些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底很不扎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真正学到手,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基础的理论还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结果,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以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使得一些有错误的作品、妨碍民族团结的作品以及其他不健康的作品得以通行无阻,任其腐蚀毒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这种情况提

醒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各族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有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联系实际而不是教条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的著作，学习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我国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三、从正面教育入手，彻底肃清“三本书”的流毒

鉴于《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严重错误和它在社会上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根据区党委的部署，要抓紧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充分利用三本书这个反面教材，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正面教育。通过举行小型座谈会、历史问题讨论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以正面教育为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严肃地指出三本书的严重错误，逐步肃清其在干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要把教育活动同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贯穿到经常的宣传工作和干部、群众的政治教育中去。要通过教育，进一步解决一些人在新疆历史问题上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把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使各族人民正确地了解新疆历史以及少数民族史。这是从根本上消除《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散布的错误观点，从思想深处确立马